

从环境与思想展望未来中国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研究〔Ⅲ〕完

山下睦男

目 录

内容提要（以下前々号）

Abstract

1 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

1・1 问题意识

1・1・1 环境与思想的关系

1・2 问题意义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1・3・1 对中国认识的不足

1・3・2 按时间顺序进行环境分析的必要性及与“李约瑟之谜”的相遇

1・3・3 循环的扩大与中日比较的引入

1・4 研究概况

2 关于研究中国问题的基本观点的考察

2・1 前言

2・2 对不可解解明的接近

2・3 中国思想的原点

2・4 中国观中出现的两种形式

2・5 结束语

3 环境与思想的关系上的中日科学技术发展比较（以下前号）

3・1 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态度

3・2 西学传入中日两国及其命运

3・3 日本的殖产兴业与中国的洋务运动

3・4 其后的动向

- 3 · 4 · 1 日本的情况
- 3 · 4 · 2 中国的情况
- 4 环境与思想：科技与经济互动关系的背景分析（以下本号）
 - 4 · 1 世界最古老的中国文明
 - 4 · 2 思想与科技的发展
 - 4 · 3 思想与科技的停滞
 - 4 · 3 · 1 对商业的蔑视观所带来的商业的落后
 - 4 · 3 · 2 儒教与科技的关系
 - 4 · 3 · 3 中国人的自然观
 - 4 · 4 与日本的比较
- 5 基于四要素循环的现实经济发展战略
 - 5 · 1 从人治国家向法治国家的彻底转变
 - 5 · 1 · 1 人民的意识改革
 - 5 · 1 · 2 三权分立的确立
 - 5 · 1 · 3 法律的统一性问题
 - 5 · 2 市场经济化的促进
 - 5 · 2 · 1 由量的扩大向质的提高的彻底转变
 - 5 · 2 · 2 质量安全保障机构的设立
 - 5 · 3 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展开
 - 5 · 4 全球化思维的促进
 - 5 · 5 金融制度改革的实施
 - 5 · 6 提高法律、规章、政策的透明度、公开性
 - 5 · 7 收入差距的纠正
- 6 总结与展望

参考文献

4 环境与思想：科技与经济互动关系的背景分析

前面已经提到过多次、即中国是四大文明发源地之一、因此在14世纪以前、为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为什么15世纪以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停滞了呢？

本章的目的就是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按照上面的思路、首先探讨一下思想对科学技术的停滞起了何种影响。

关于这个问题、尽力解明的研究者极为少见、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可算是李约瑟与爱克思坦、其中特别是李约瑟、可谓是个问题研究的第一人。

但是、李约瑟的分析也只停留在环境→科学技术→环境这样一个两要素循环的分析上、缺少思想内容。从这种意义上看、我认为本研究的四要素循环分析具有很大意义。

另外、许多环境决定论者间接地指出、环境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各种观念与行动、强调环境的重要性。本研究首先在这里谈一下布拉修。“人文地理学原理”的作者布拉修在该书中写到：“人类的社会集团与植物和动物的社会集团相同、是以服从环境影响的诸多要素而组成的。他们是何种风吹集来的、是从何处来的、是什么时代的、这些虽然无从所知、但他们居住的国土相同、并且逐渐地具有了该国土的特色。”⁽¹⁾ 这就是著名的环境决定论。

各个国家的人多受到各自国家的历史、地理环境的影响所形成的便是思想。因此、各个思想都是以最适合各自的环境而产生、发展的、所以别人无疑没有去评价的余地。

虽然是这么考虑的、但遗憾的是、现实中以自己为标准嘲笑、指责、甚至歧视那些与自己肤色不同、行为不同、习惯不同的人还大有人在。

毋庸置疑、众所周知作为哲学问题之一、对于人的本性有两种观点、即一个是“人性性善说”、一个是“人性性恶说”。

主张性善说的代表者有下面要谈到的孔子及“埃米尔”的作者卢梭。主张性恶说的代表者有韩子等等、主张性恶说的人包括我本人在内有太多的人、举不胜数。

两者主张的内容省略不谈、但作为一个评论、在这里介绍一下卢梭的“埃米尔”中表现的他的观点。他认为、人在出生时都是善的、只是在成长过程中染上了恶

习。人在成长过程中给予他们影响的无疑是社会环境。

卢梭是如何考虑这个社会环境的呢？没有和他对此讨论过、也不可能和他讨论。但是、所谓环境是人创造的、那为什么性善的人们创造的社会环境却是恶的呢？

卢梭缺少了这方面的说明、而缺少的这部分正是最重要的。

我的观点正如前面所述是主张“性恶说”的。我认为、人天生具有恶的内核、随着人的成长、其内核本身也在增大。同时环绕其内核周围的善、我认为就是良心、这个善包含着恶的内核。

善的成分越少就越容易表现恶的行为、即所说的恶人、而所说的“善人”是善的成分多、根本不给恶露头的机会。

如果不这么认为的话、如后面所述、我倒想问为什么产生了法。正因为人是象“性恶说”那样的人、所以只能用法来控制人的行为。

这个问题较为深奥、各种观点也很多、所以在这里不想做深入探讨、还是回到重要课题的分析上来。

4 · 1 世界最古老的中国文明

通过对挖掘出的古迹研究得知、汉民族的祖先已开始使用彩陶、过着农耕生活。距今五千年前、汉民族生活在黄河流域、过着农耕生活。

至今五千年的漫长岁月、一直保持着同一民族、建立起高度的文明、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

巴比伦、埃及、印度、希腊等等、这些建立起古代文明的民族不是相继灭亡、就是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但只有汉民族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仍然是一个统一的民族。

并且、汉民族还不断发展、拥有的领土面积为世界第三、而人口则是世界第一。而且、从地理环境上看、很少受到外来文明的影响、具有自己独特的文明。

中国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也很大、有许多的发明和发现、可以称得是世界的奇迹。

殷曾是统治‘中原’地区的一个国家、而周国则建在西北部的陕西省。这里的西北地区并非边境、自古以来文明非常发达、这一点已得到了考古学的论证。特

别是沿渭水一带、哪里是古代文明的发源地。长安曾是周、秦、汉、唐的首都所在地、水资源丰富、农业发达、从而具有稳固的经济基础。

但这里也是北方游牧民族经常南下的地方、自古以来居住着很多的民族。

据周的始祖传说、周是象征黍子的后稷子孙、与周边的游牧民族不同、自古以来过着定居农耕的生活。

到了殷的末期、殷在这一地区也有一定的势力、因此、周继承了殷的文明、增强了自己的势力。在公元前十一世纪、武王灭了殷、统一了华北地区。

在殷与周的交替中、周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殷的文明、但由于两者的文明基础原本不同、所以、两者文明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到了周代、权威象征的青铜器铸造虽然依然盛行、但铭文中出现了殷代未有的受西方文明影响的内容。特别是政治思想和制度上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殷代进行的是祭政一体的政治、而这时信仰的对象是祖先神、并且、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对自然物的崇拜。

但是到了周代、与这种信仰的同时、还出现了把天作为最高神这样的信仰。如果一神教是游牧民特有的这一说法正确的话、那么、可以说周的文明受到了北方民族很大的影响。

靠对天的信仰、统治者以受天命的名义而凌驾于人民之上、同时也产生了失去天命便是改朝换代之时这样一种革命思想。

这种政治思想对中国的科学发达产生了根本的影响。

这一时期之后的一些发明在此省略不谈、只就天文学领域谈一下。任何一个古代文明国家、天文学自古都是非常发达的学问。农业生产与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历法知识便是天文学这一科学的反应、与此同时、古代社会中非科学的一面占星术也很发达。

天文一词正如“易教”八卦中所写的“观天文、以察时变”一样、原本是表示日月星辰的位置及其变化、这里的意思是根据这种现象判断季节的变化、即历法。

但是、“易经”系辞传写道：“天垂象、表吉凶”、人们通过天文现象来占卦未来的吉凶、他们认为这是最高之神上天给与的前兆。这时、特殊的天文现象、例如日月食和彗星的出现等等都会作为不祥之兆给人以恐怖、对于这些

特殊现象、统治阶层特别关心。

占星术的产生出自于天上世界与地上世界具有很深的联系这一古代理论思维、最初产生于对自然现象的恐惧。

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战国时代、占星术在中国已形成了组织化。这个时期、战乱不断、各个国家都为自己的存亡感到不安。

很久以后、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都在身边配置了占星术师、每当战争开始时总是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与日本战国时代前的情况非常相似。

到了汉代、建立起了稳固的统一国家、占星术不仅与军事相结合、而且与政治理念具有很深的联系。最高的统治者皇帝也称为天子、这一称呼的产生出自于按照天的意志进行统治这一中国独特的政治理念。

把天看为创造神的思想虽然很稀薄、但一般把天认为是万物的主宰、具有最高的道德、并且包含着自然的法理。并且认为、天具有自己的意志、它对于政治的善恶通过天文现象、地上的自然现象来表现自己的意志。

天子必须不断努力通过这些自然现象理解天的意志、来进行统治。

这种政治理念在汉代得以确立、在以后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一直被遵守下来。

天的法理可以用自然法则一词来表现、但在中国人的想法中、这样的自然法则靠人的力量是无法解明的。

在欧洲近代科学的发源地希腊、人们认为、靠人的努力、可以发现自然法则、这种信念成为了发展近代科学的巨大动力。

但在中国、自然法理的体现者天具有自己的意志、天按照其意志任意引起自然现象、特殊的自然现象是天对政治的警告、所以、人是无法预测的。

在其后的唐代、预报的日食由于计算上的错误没有发生、于是、臣下们把此归因于善政而向皇帝呈上恭贺之文。可以说这表明了自然法则不可知的立场。

可以说、这种信念的缺乏是造成中国人没有追求自然法则热情的一大原因。⁽²⁾

4 · 2 思想与科技的发展

李约瑟在其大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一书中、对(1)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科学革命？(2)中国为什么在14世纪以前技术上领先于西方？(特别是第一个问题、一般被称为“李约瑟”之谜)这两个问题提出明确的答案、但其要点终究还是“环

境决定论”。即、中国在14世纪以前、科学上世界领先（这一事实原先并不为人所知、让全世界了解了这一事实是李约瑟博士的巨大贡献）。“中国农民在欧洲还在使用木制农具时就用铁耕作、但欧洲人使用钢时却依然用铁耕作”^{〔3〕}、这就是由环境所造成的。

正如李约瑟指出的那样、没有中国的贡献、也许就没有我们文明的进步。因为、没有火药、纸、印刷术及指南针、欧洲封建制度的消亡是无法想像的。并且、如果对环境条件加以充分说明的话、欧洲人对自己发展了近代科学与近代技术也就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了。

能力何处都有、但与其相适应的环境并不是何处都有的。

那么、14世纪以前引领世界的中国科学技术所处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呢？

这正是前面所说的李约瑟之谜。但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谜、完全可以说是环境所带来的必然的历史产物。因为、正象前面几次提到的那样、由于具有优良的环境、所以中国才成为四大文明发源地之一、在此基础上产生更先进的文明也决不奇怪。人类当然是追求更好的、效率更高的、更舒适的生活。四大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一旦诞生、生活于此的人们为追求更好的生活、会动脑筋创造出更多的发明。这些都是必然的结果、完全可以理解。

这只不过是应该发生的发生了、应该发展的发展了。

我认为、15世纪以后、中国的科技为什么停滞了才是真正的问题。

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人治国家”、而非“法治国家”的原因、我想也在于此。

4·3 思想与科技的停滞

4·3·1 对商业的蔑视观所带来的商业的落后

“山下之谜”这一问题的解答、由于这是一个多种因素交错在一起的极为复杂的问题、所以、主要从下面几点加以说明。

首先第一个主要原因可以说是由于“中国中心论”所产生的自远古以来对商业极强的蔑视观。

“商业”这一词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公元前。据《史记》记载、殷统一王朝的初代国王为汤王（成汤）、定都于亳、即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县（太阳照耀下的高丘之意）。

商丘县自古至今曾遭到近20次黄河洪水的泛滥、所以殷的古迹已无从寻找、据史学家讲、应在今县城西南约30公里处。这地方位于黄河的南岸、遭遇洪水的危险很大。殷朝时的人们不断变换地方、一时曾移居到山东曲阜的北面。但只要在黄河的东部、就避免不了黄河泛滥的危险。于是、盘庚下决心要迁都到黄河西北岸的安阳。安阳位于亳的西北部、直线距离约230公里。从此、安阳做为殷后半期的京都、八世十二王、长达273年繁荣发达。

从已住惯了的、祖先传来的故乡——商丘搬到数百公里以外的北方、对此殷人是坚决地反对。

流传至今的“商书”中一有许多是三国时代的假作、或者既使不是假作、大多是战国时期某人收集的一些古代文献捏造出的文章。

但“盘庚”上、中、下三篇确实是盘庚告诫那些反对迁都的人们的文章、比文献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下面引用其中一些内容：

“汝曷弗告朕、而胥动以浮言、恐沈于众。……则惟尔众、自作弗靖、非予有咎。……汝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幼、各长于厥居、勉出歹力、听予一人之作猷。”（上）⁽⁴⁾

“乃有不吉不迪、我乃剿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住哉、生生！今予将试以迁、永建乃家。”（中）⁽⁵⁾

对那些反对迁都的人们、盘庚威严地告诫到、迁都是百年大计。

这样、殷人们才不情愿地抛弃旧居而移居现在的安阳。

安阳南约30公里处有个叫淇的地方、那里有后来所建的殷的外城池或离宫的痕迹。殷最后的国王——纣王被杀之地朝歌就是淇这个地方。

“商”原先是殷人对自己部族的称呼。他们把殷代前期的故都称之为“商丘”或“丘商”、把安阳新都称之为“天邑商”。

“殷”原本是位于黄河中游的他们狩猎地的地名。在西面窥视中原情况的周国人把出没于殷这一地方的商的部族称之为“殷人”、后来、“殷”成为这一部族的代表名称。当然、他们自己不使用“殷”这一名称、在卜辞中也是经常使用“商”这一名称。

后来、殷的后代建立了起来的宋国中保存有祭祀祖先殷人的雅乐、起名为“商

颂”、收录在“诗经”中。

“商”到底具有什么意思呢？

这个字是以文章的章（花纹·鲜艳）的略字为音符、下面加上一个高台形状的字而形成的。

章这个字与昌明的昌（清楚·鲜艳）也很接近、另外与太阳、阴阳的阳字也是同系的。

具有太阳高照、沐浴阳光、鲜艳明亮的意义。

这意思是他们的故都“商丘”是阳光照耀下的明亮高地、这个地名很好地表现出了“商”这个字的原义。

为了躲避潮湿的湿地和黄河的洪水、他们来到高地定居下来。并且、在此生活的人们自称为“商”⁽⁶⁾。也就是说、“商业”这个词的由来、始于公元前“周国人”由“商”这一活动在黄河中游部族的狩猎地名（殷的领地）将“商人”称之为“殷人”、而他们本身（“商人”）并不使用这一名称。即“商”是自称的部族名称、而“殷”是其他部族所称呼的名称。

正如历史事实那样、中国在那个时期、具有“地大物博”的优越环境、产生出世界的中心、王者这样的“中国中心论”、并且这种思想得以延续下来都可以说是必然的结果。

后来、“周”灭掉了“殷”。“殷人”虽然是“亡国之民”、但他们发誓要向“周”报仇。但是、他们必需与之交换日常的生活用品以及为报仇所需要的武器。他们制作出拿手的陶器、漆器及织品、用这些来换来他们所需要的东西、默默地做着复仇的准备。“周国人”实现了统一后、部族割据的情况有了改变、交通也一定程度上方便不少、于是、出现了象吉卜赛一样的商队、往来于东西。这些人就是发誓要向“周”报仇的“商人”、从此、新的职业在地球上诞生了。

这些人正是“商人”、从此产生了商人一词。但这种行为如果从“中国中心论”上去看的话、是一种难以想像的可耻行为、因而、从此商人与犹太人一样长期受到歧视。⁽⁷⁾

当然、看一下中国历史、众所周知、中国商业发达、并持续发展。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忽视隐藏在发展背后的歧视商业的思想。

如果中国的商业发展与欧洲的商业发展同样没有任何压制的思想的话、中国的

商业必然要比历史上展现的情况发达得多、并可能极大地改变中国后来的历史。

但如前所述、中国并非如此、这一事实我们不该忘记。

那么、为什么“中国中心论”派生出的商业歧视能成为科技停滞的答案呢？

回答很简单、因为发明与商业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就是说、人追求富裕生活的欲望自古便是无限的、为了实现更好的生活、就要创造出（发明）某种东西、并将它卖出去（商业）、从而可以得到“钱”、买到所喜欢的商品。

既使制造出东西（既使发明出东西）、如果根本没有人买、或者买卖这种行为受到歧视的话、制造的积极性便产生不出来。

14世纪以前、虽然有歧视商业这样的制约因素、但中国仍能以过去的遗产领先世界。15世纪以后、由于其负面因素的作用、中国的科技发展停滞下来。即、四大文明发源地之一的中国在14世纪以前领先于世界、但由于以上原因、以后便处于停滞状态了。

4 · 3 · 2 儒教与科技的关系

对中国科技没能发展的另一原因、李约瑟是这么认为的、即“儒家认为法庭上所有事件都应由理非曲直来裁定、他们以这种温情主义的正义为是。而法家则主张任何事件都要靠事先制定的法典来裁定。某些方面、法家具有现代的权力主义色彩。这一学派没有获得成功、现在已经消失了。法家没有成功也许是中国没能发展近代科学和近代技术这一事实的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吧。”⁽⁸⁾

另外、马克斯·维伯也指出了中国缺乏自然科学思维这一原因。但对于中国以前的几个发明、他与李约瑟相反给予了消极的评价。⁽⁹⁾

总之、历史上最重要的事实是、儒家与法家围绕国家的政治体制问题展开了权力斗争、其结果、儒家取得了胜利、并长期统治中国、法家遭到了失败。即、儒家的胜利使得以后的中国“以权代法”成为可能、现实中也出现了“约法三章”、从而使中国成为地球上最大的人治国家。

另一方面、关于法家、李约瑟说：“现在已经消失了”⁽¹⁰⁾、但这是一个错误。因为、法家虽然在权力斗争上失败了、但并没有消失、以后仍被保存了下来。我认为、规定及手续的繁杂、及现实中的“繁文缛节”便是其产物。另外、残酷的刑罚也可以证明法家的存在。

以上将权力斗争中取得胜利后的儒家的统治做为中国科技停滞的一个原因而加以说明。更具体地讲无非是这样的：理非即符合道理和不符合道理、曲直即有理和无理、儒家以此为标准判定所有事物。看上去这种做法似乎符合道理、能够让人接受、但从中国历史上经历的事情上看也可以清楚地知道、它没有法家那样统一的尺度和标准、完全是根据判定人的判断而决定。因而、即使是同一件事件、有时是有罪的、而有时却是无罪的。

类似的事情我们外国人现在仍能遇见到。“预定即未定、决不是决定”这种情况也可以认为是出于这种观点。

另外、“朝令夕改”也是出自于同样的观点。

4·3·3 中国人的自然观

下面谈一下中国人的自然观。

林语堂(49)在其著作“我国土、我国民”中这样写到：“统治阶级不仅来自农村、他们还要回到农村、总是认为农村的生活方式是理想的。美术、哲学、生活中的这种田园理想已深深埋藏在中国人的意识中、也是现在民族健康的重要原因。”⁽¹¹⁾

“如果评价中华民族、叙述其特征的话、也许就会看到如下的性格特征：(1) 稳健、(2) 简朴、(3) 热爱自然……。”⁽¹²⁾ 将热爱自然列为中国人特征的第3位。他还写到：“其实、中国精神如同从命运注定的境遇中吸取幸福的最后一滴一样、对微不足道的碎石中寻找出美非常敏锐。既使酱外巷战激烈、但只要墙上有一幅崇山峻岭或猫戏蟋蟀、中国人都会苦思冥想。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美是瓦茨俄斯派与中国人的想像价值。瓦茨俄斯其精神在英国诗人中是最中国的。”⁽¹³⁾

并且、林语堂还这样写到：“在湖心时、却不辞辛苦去山麓、在山麓时、却要登山顶。壶里有酒无酒不喝、眼前有景无景不赏。人生大多不过是一场戏。与其进入戏中、不如偶而站在外边微笑旁观岂不更好吗。我们是以富有变化的视觉观赏人生、而非如梦初醒那种昨夜的梦境心情。飘渺不定的、令人困惑的、难以得到的东西、既使是一点点的东西也会抓住不放。中国人总是回到自然中去、因为自然是真与美深奥不变的幸福永恒的源泉。既使忘记进步、失去国力、中国人仍能打开窗户去倾听那阵阵蝉鸣与秋风落叶、去闻那菊花芳香、去赏那山上的明亮秋月而心满意足。”⁽¹⁴⁾

从以上林语堂的文章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中国人比其他民族倍加注重自然。这里无须说明、对自然敬畏之念越强、那么改造自然、即破坏自然、挑战自然就越是消极。

发明在初级阶段时、人们追求更好生活的欲望很强、因而出现了一个发明接着一个发明、发明又产生新的发明这样的循环、那里的生活也因此变得更加便利、更加舒适。但我认为、当发明达到一定水平时、它便扩展为向自然的挑战、中国人由于有以上那种对自然极强的敬畏之念、从而对发明起到了抑制作用。

那么下一个问题便是、与其它民族相比、中国人为什么会产生极强的对自然的敬畏之念呢？

人的生活态度与观点有两种、一种是认可状态、并以此为前提生活的生活态度、一种是不满足于现状、总是在追求中生活的生活态度。我把前者称之为“Sein”、把后者称之为“Sollen”。这两种生活态度如果结合中国思想考虑的话、前者为“天命思想”、后者为“中国中心论”。

看一下中国历史便可知道、古代中国的统治体系是一小部分统治者和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再加上“上意下达”这种关系、根本无法反映民意。但所说的一小部分统治者、并不是说总是那一小部分人代代长期统治中国、而是发生了多次的权力交替、新的统治者毕竟原先也是平民百姓的一员、如果考虑到这一点、我认为完全可以理解中国整体对自然所具有的极强的敬畏之念。

总结以上内容、中国科技停滞的原因可归纳为以下3点：（1）历史上的商业歧视观、（2）非科学的儒家统治、（3）中国人传统的自然观。

以上就思想与科技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对于两者的关系、汤浅光朝氏等已作了论证。另外进行相关研究的还有林雄二郎、山田圭己[97]、刘则渊[94]、[95]及[96]等等。

4 · 4 与日本的比较

下面、与中国比较一下日本对科技的特征。

中村氏[25]这样说到：“日本的思想是这样的：因为重视闭关的人伦组织、所以一般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承认人际关系对个人的优越、崇尚有限的人伦组织。这从历史上看的话、如家庭道德的尊重到国家至上主义。并且、在日本人中

间、由于对特定个人的绝对归依态度显著、所以国家至上主义也是以崇拜天皇的形式表视出来的。另外、宗教的、派系的闭关性显著、为了保护一旦形成的人伦组织、即使付诸武力也在所不辞、这与武勇的态度是一致的。由于重视人伦组织、所以道德的反省比较敏锐、但由于不愿意考虑超人的东西、所以极其缺乏对宗教尊贵的自觉。而且、日本思想是非合理主义的、直观的、情绪的倾向较强、缺乏组成复杂想象的能力、喜好单纯的、象征的表象。由于缺乏有关客观秩序的知识、所以未能发展自然科学。”⁽¹⁵⁾

中国有“中国中心论”与“天命思想”、因而放松了学习、其结果如前所述、15世纪以后、中国科学进步出现了停滞。而日本与中国相似、长期实行了锁国政策。但在培理率领的舰队打开了日本国门后、日本立刻发现日本科学在世界上的落后程度、于是以“脱亚入欧”这种精神、开始吸取引入欧美的先进文化。

而中国也在同一时期展开了“洋务运动”、要引进欧美的先进技术。但由于此前所处的状况不同、即中国整体并没有强有力地统一起来、以及由于如前所述的对引入先进技术起强烈抑制作用的思想的存在、而没有获得成功。

另外、这里还应注意的是、两国在吸取引进先进文化的方法上存在的差异。

文豪巴尔巴克在其著作《中国的过去和现在》[8]中、对中国人和日本人做了比较。他说、中国人是照搬地吸收引进、而日本人则是在吸收引进上采取适合日本人的方式、有时甚至把它变成似乎另外一种东西。⁽¹⁶⁾也就是说、中国人由于上面所论述的“中国中心论”及“天命思想”产生出对科学的抑制力、即把科学认为是创造力的话、中国人优秀的模仿力与日本人出色的模仿力加创造力之间的差异。

日本无疑也从中国吸收引进了许多东西、比如从中国吸收引进的汉字（模仿）、但日本以此为基础又发明（创造）了平假名和片假名、这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例子了吧。

注

- (1) 见布拉修[11]P. 53。
- (2) 见爱克斯斯坦因[44]P. 44。
- (3) 薮内[107]PP. 4—39。
- (4) 见冈田[34]。

- (5) 见冈田[34]。
- (6) 请参考冈田[34]。
- (7) “士农工商”一词出自中国古代历史书、在那些文献中、“士农工商”被看作为平等的职业。日本中世时期、也将“士农工商”平等看待。但中国汉代以后、商业一直受到歧视、从而、在江户时代、引进宋·明代儒学的日本儒学家将“士农工商”解释为上下身份的差别。其结果、武士成为社会的最高阶层、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次之、而从事工商业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特别是商人是四民中身份最低的。汉代以后、由于皇帝实行重农轻商的政策、从而产生了士为社会最高阶层、上最为卑贱的思想。唐代和宋代轻商思想都很严重、这项符合儒家思想的政策至少一直持续到清代末期。详见植松[112]。
- (8) 见李约瑟[7]PP. 21—25及[16]PP. 147—150。并见李约瑟[7]P. 10及[16]PP. 140—141。维伯也在[10]中指出了中国缺少自然科学思维的原因、但对以前中国的一些发明评价极为消极。详见维伯[10]PP. 255—283。
- (9) 见维伯[10]。
- (10) 见李约瑟[16]和[7]。
- (11) 见林[49]P. 54。
- (12) 见林[49]P. 67。
- (13) 见林[49]P. 159。
- (14) 见林[49]P. 564。
- (15) 参见中村[25]PP. 203—204。
- (16) 见巴库[8]。

5 基于四要素循环的现实经济发展战略

5 · 1 从人治国家向法治国家的彻底转变

5 · 1 · 1 人民的意识改革

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各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更加紧密。既然如此、对中国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治国家向法治国家转变的问题。就是说、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法治国家、中国也必须如此。

80年代中国制定了各种法律（例如：81年的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经济合同法、82年的商标法、83年的专利法、85年的会计法及涉外经济合同法等等）。2002年、由于2001年末入世的影响（这也是当然的）更是举不胜举的。如果全部收集到一起的话、恐怕比日本的六法全书还要厚。

就是说、根据以上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在很急促的情况下、且短时间内、起草实行的法律数量难以置信。

这样一来、就存在着法与法的统一性问题、法与法的优先主义问题、审判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问题、中央政府条令与地方政府条令之间的问题等等、这些问

题既复杂又麻烦、只能随着时间慢慢地一点点解决。

另外、除了法律上的问题之外、“法院”的独立性的问题、即、在中国还没有确立三权分立、没有司法独立的情况下、法官的资质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也是举不胜举。

但在这里、我们不对此问题深入探讨、只想回到原来的思路上将这些探讨归纳一下。

用一个逆说的论法、站在一般大众的角度看一下这个问题。

追溯到公元前、由于儒家的观点、中国不是“法治国家”、而是“人治国家”、对此上面已经论述过。但是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后、即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具体举一个“遵守交通信号”的例子讲一下。

以我个人的体验讲一下（16年前、1986年至1987年、在中国生活了一年、根据这时的体验）、当时的大连、我记得只有二、三个信号灯（当然、再往前追溯的话、也许没有信号灯）、即可以认为几乎没有信号灯。

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行动是怎样的呢？

首先、几乎没人遵守交通信号。即说的极端点的话、人们长期自由横穿马路、怎么可能马上遵守交通信号呢。

这是长期的习惯问题、那些自由横穿马路的人们甚至不懂遵守交通信号的意义、只是把信号灯当作一个希奇东西的摆设而不予理睬。当然、对于不懂信号灯意义的人来说、用不予理睬这样的话、我也觉得有点奇怪了。

1998年“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汽车时代的进程加快、车量增加、新建道路也大大地增加、汽车再进一步增加的话、汽车社会将会出现在中国。

但那以后、以我的体验、人们并没有出现积极遵守交通信号的情况。

2001年、再次有机会在中国生活一年、对人们遵守交通信号的情况、我观察了16年、但遵守家庭经营信号的人数依然没有太大的增加（当然、在几处有警察看管的地方、确实普遍能够遵守、但没有警察的地方、仍普遍没有遵守）。

虽然媒体上一再强调遵守交通信号的必要性和安全性。

那么、因为是中国人的长期习惯就没有必要遵守了吗？

回答当然是“不”。

中国汽车时代的进程比起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快得多、已经令人吃惊、但

相应的交通事故也多。看到这种情况、只能想办法让人们遵守交通规则。

上面讲的是一般行人的情况、这个问题对开车的司机也同样适用。即感到开车风范较差。

另外、交通规则也有必要改进。

因为、人行横道为蓝灯时、当然行人应该过马路、可是这时候对于车来说是红灯、但允许右转弯的车右转。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应该立即改正。

并且、这在日本也有同样情况、就是右转或左转的车辆不顾行人的问题（这也非常危险）。

即车比人优先、对此应严加管理。

总之、在这想要说的就是、要让人们守法（交通信号）、就要采取严惩主义、虽然对不住那些行人和司机。

严惩主义的内容就是令人瞠目的罚款。

犯猎时、对其的处罚越轻就越轻易重犯、我认为人具有这种恶习。因此、严惩对抑制重犯效果很好。

通过媒体向一般大众宣传此方法、处罚实施后、这种习惯必定有所改变。必须守法（交通规则）这种观点和行动将成为新的习惯、也必须成为习惯。

5・1・2 三权分立的确立

为了确保审判的公证性、日本、美国等众多国家都将法院的独立性做为一个制度而加以确立。

一般将司法机关——法院放在立法机关（在日本为国会）和行政机关（在日本为内阁）对等的位置上。这三个机关相互协调、相互制约。在中国、宪法与民事诉讼法上也有关于“法院独立”的规定。

但是、这（法院的独立）只是在与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的关系上保持独立、在与国家权力行使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上、则各其监督、对其负责。即、在中国、法院自身的独立性没有作为制度确立起来。

在日本、美国等国、另一个确保审判公正的重要制度是每个法官的独立、即、每个法官进行审判时、“根据自己的（职业的）良心”进行判断、不受法院内的

领导及上级法院的干涉。这个在中国也没有做到。

在中国、没有执行每个法官的独立、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各级法院领导（院长）及审判委员会对审判的监督做为制度而确立、相反、对每个法官“靠自己良心”的判断持否定态度。

实际审判中、法官听从院长或审判委员会或上级法院的情况也不少。

审判委员会由各法院领导（院长、付院长、各部部长等）组成、主要对重大事情进行讨论、也是监督法官工作的机构。

在中国、不允许法官的独立、这也许符合中国的情况及制度。因为、中国与美国、日本等不同、判例的约束性没有做为一种制度、为此、要进行不相矛盾的、统一的判断、由上面监督每个审判的制度可以说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

另外还要注意的、为了保证判断的统一性、还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这样一种重要制度。

中国的法官没有受过专门法学教育的比例较高（以前、往往由解放军退役干部担当）、缺少法律知识和素养的情况也不少。在每个法官的资质不太高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审判的一定质量、无可否认上面的监督是必要的。但是、中国法官的资质由于这几年实行的法官法、特别是2002年开始的统一司法考试、今后会大大提高的。

再加上在中国三权分立的确立、特别是涉及外资企业的纠纷案件、除了法院、还应知道有仲裁这一解决方法。

仲裁是由当事人决定的纠纷解决者（仲裁人或仲裁机关关系代替法院解决经济纠纷进行的调解、外国企业多以“仲裁”做为解决纠纷的方法。

5 · 1 · 3 法律的统一性问题

在（一）的人民意识改革中也提到过、就是80年代以后、在中国起草、施行的法律数量特别多、因而有必要认真考虑一下法律的统一性问题。

问题发生时、统一性的问题才会做为现实问题出现、今后、这样的问题一定很多、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对于有矛盾的地方、有必要进行修改。只有这样、今后才能更多地引进外资、经济才能更加发展、因此有必要努力创造一个安心的、积极活跃的环境。

5 · 2 市场经济化的促进

5 · 2 · 1 由量的扩大向质的提高的彻底转变

林语堂在其著作“我国土、我国民”中这样说到：“中国民众的悲惨命运正是由于采用被歪曲了的欧洲生活标准而产生的、欧洲的生活标准就是住在温暖的房间里聆听收音机广播才是幸福的生活。但是、这个标准如果正确的话、1850年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就没有幸福了。既使粗茶淡饭、只要能确保温饱就是幸福的。”

这无疑是“什么是幸福？”这样一个有关幸福论的论述。在这不想对此问题深谈下去、如有机会、将在别的章节论述。

这里想要说的就是、对于长期受苦受难的一般大众来说、最重要的是生存下去。要生存就要有吃的。在没有量的时代、何谈质的问题。

林语堂所说的正是这种呼声。林语堂的主张完全正确、对此毫无异议。若对此有异议的话、正说明他不了解中国。

中国菜盐分多、量大、且放很多大蒜、被称为“烧菜”、这些不需借林语堂的话、只要看看中国以前所处的历史便可理解。

但是这种状况毕竟是1978年以前、严密地说是70年代以前中国的状况（当然、80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确是10%的高速增长、但是、贫富差距较大、特别是农村的贫困依然存在）。

80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令世人吃惊、特别以城市为中心、量已得到充分的增加、其结果、城市里的人开始把目光投向质的方面。

因此、做为供给方的厂家商家不重视质量就会被淘汰、进入90年代及21世纪、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后、这种情况将加速发展下去。

从这种情况看、今后商品的生产只重视量而不重视质、将被市场竞争所淘汰。

下面谈一下具有一定标准的“绿色食品”这一商品。

5 · 2 · 2 质量安全保障机构的设立

日本与中国对农药使用的标准不同。中国出于低成本种植的需要、现在仍使用农药。

但、从中国向日本直接出口的农产品很多、无农药食品的出口也在增加。

有机食品的定义是指、在其生产及加工过程中、不使用任何人工合成的农药、化肥、除草剂、成长激素及各种添加剂、原产地无直接污染、并且、大气、土壤、水等环境条件符合国家质量标准。

另外、生产加工以外的销售、贮藏、运输各环节中也有规定、销售人员、仓库的环境、包装及器具等不能受到污染、也不能使用化学合成物质。

提到有机食品、总易想到蔬菜、水果等商品、其实也有有机香烟、啤酒、有机绵制作的衣服等商品。

有机食品与“绿色食品”在生产、加工过程中所要求的标准是不同的。

“绿色食品”分为“A级”和“AA级”、以农产品为例的话、在日本“A级”为“减农药农产品”、“AA级”为“无农药农产品”。

而有机食品的标准是世界通用的。

现在、在中国被认定为“绿色食品”的商品有1000多种、今后还会增加。

加入WTO以后、中国食品的质量将会大大提高。现在、有机食品的消费率瑞士、奥地利、丹麦为2~3%、美国为0.4%、日本为0.2%、欧洲各国最高。

但从世界整体而言、有机食品比前一年增长320%~40%、这一点要注意。

这样的问题、消费者不感兴趣、不注重环境的话、是不会有改变的、因此、中国何时能注重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问题。

从“绿色食品”向有机食品的过渡中、包括其它食品在内的商品的标准化将是中国今后的课题。

5·3 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展开

200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之际、发表了江泽民主席“三个代表”的“重要讲话”、其内容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①是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代表②是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③是最广泛人民利益的代表。一年以来、媒体都在大力宣传“三个代表”。

这期间、自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做为三大改革之一的国有企业改革也到了关键时刻。

以前的“国营企业”进行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即引入了美国式的出资不经营的经营方式。以后、以朱镕基总理为首开始了国有企业改革、客观地说、还

有不充分的感觉。

国有企业的改革确实带来了失业这样的阵痛、但这对中国是一个大问题、不进行改革的话、便无法发展。

简单地讲、国有企业也和其他行业一样、必须引入市场经济、即竞争机制。效率差的国有企业淘汰掉、生存下的企业必须提高效率。但客观地讲、这种改革还是不够充分。

这种改革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失业问题、这个问题如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吴敬琏所说的那样、要靠中小企业（私营企业形态）。

浙江、江苏的私有企业发展情况很好、有破产、失业、也有许多新企业诞生、解决了失业问题、没有成为社会问题。

另外、吸引外资的结果、还会有更多的外资企业进来、这也可解决一部分失业问题。

必定会有一种好的方法、必须努力寻找它。

朱镕基总理推进的国有企业改革、其要点之一是排除政府对企业经营的干扰、即“政企分离”如果成功的话、将会产生欧美式的企业统治。

当然、另一方面、共产党对私营企业的扶持似乎是与“党企分离”的做法相反、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来需要一番研究。

资本家的入党问题遭到了党内保守派的反对、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是不得已的。

在13亿人口的中国、共产党员有6000多万人、从私营企业家入党问题上看、中国共产党正在探索由阶级政党向国民政党的转变。

是党吞掉企业、还是企业吞掉党、这种较量将使党和企业达到新的融合、但、其形态应该是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也必须是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5 · 4 全球化思维的促进

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以后、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中国已意识到应成为国际经济中的一员。并且不那样的话、就不能推进“改革·开放政策”。2001年末加入WTO将更会加深这种意识、中国经济正逐步将国际化思维纳入其中。

中国市场增长最快的商品是手机、电脑、钢琴、汽车等10万日元以上的高价耐

用消费品。

从与国际化思维的关系上看、可以说有众多使用互联网的人。即使没有自己的电脑、到处都是网吧、因此接通互联网、了解世界情况的人数虽没有统计、恐怕也是世界上最多的吧。

一个国家发生变化的因素有许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了解情况。

使用互联网的人口必定还会增加、今后数年内、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国际化思维都会逐渐普及、国际化思维的促进只是在与时间竞争。

5・5 金融制度改革的实施

中国四大有商业银行（①中国银行②中国工商银行③中国建设银行④中国农业银行）至今为处理不良债权已将 1 兆4000亿元（约21兆日元）分离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但依然还有 1 兆8000亿元不良债权。不良债权比率（占贷款总额的不良债权额）为26.62%、其中1300亿元无法收回。

国有商业银行计划每年削减 3 % 的不良债权、预计 3 ~ 5 年内可基本解决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如果内需顺利扩大的话、这种前景还是乐观的。

中国也开始着手解决做假帐及违法买卖股票等问题、并先于日本引入了上市公司季度决算制度。中国的上市公司至2001年末为1154家、市价总额为约65兆3000亿日元、与香港市场相差无几、在亚洲可排第二、第三。中国的证券市场有时被评为比“赌博风险还大”、不完善的地方还很多。

中国银行在2001年 5 月做为中国四大有商业银行首次开始按照国际标准公布不良债权比率。创业90周年的中国银行其前身是清朝的“大清银行”。做为唯一的外汇专业银行、新中国成立后、也一直在政府的管理下运营。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金融机构要在21世纪继续发展、当务之急是要处理不良债权。

2006年、外国金融机构可以做与中国的银行同样的业务、在此之前、必须解决不良债权问题。

必须尽快进行中国金融部门中的二大支柱——直接融资的股市和间接融资的银行的改革。

5 · 6 提高法律、规章、政策的透明度、公开性

不仅中国经济、中国所有的事情我都感到都是不为人所知。

以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一般大众的关系是“上意下达”的单方关系、那时、如果反抗可能丢掉性命、因此一般大众只能盲从忍受。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无疑在变化、并且、要实现国际化的话、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就是要执行一般人都知道的这样一种“消费公开原则”。客观地看、现在这方面做的还不够。

尽可能地公开更多的消息、如果用法律的形式把它制度化的话、腐败等违法现象无疑将减少、新的、公平的中国将诞生。非常希望各经济主体立刻实现这一原则。

5 · 7 收入差距的纠正

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同时也应看到现实中正出现一个问题、并且这个问题越来越深刻。

“改革·开放政策”实际是在79年首先在上海等沿海地区开始的、其结果、中国国内产生了地区差别。最贫穷的内陆省贵州省人均GDP为340美元、不足上海的十分之一、与孟加拉国、苏丹相差无几。

经济产业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关志雄说：“正如亚洲各国、各地区以日本为先头成人字形发展一样、中国国内也是以上海为先头从沿海到内地成人字形发展”。

中国国内成人字形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IT）领域、中国发展的速度很快、移动电话数量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去年十月末达到了1亿3600万台、占人口的普及率为9%、不到日本的六分之一。但沿海地区的上海、广东等地为30%、与发达国家相当。

从这种情况可以看出、现在中国存在着①城市与农村②城市与城市③农村与农村的差别、特别是这离沿海地区的农村贫困相当严重。

中国政府当然没有放置这个问题、正在采取各种纠正差别的方法、其中“西部大开发”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但是这个计划短期难以实现、并且计划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基础建设是否能建好等、并不那么简单。

因此、在这里建议：确保富裕地区的税收、将资金转移到贫困地区、即收入再分配。

现在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是20年前实行的、已经不适合急速发展的市场经济。

当然、事业税等也要认真考虑、采取富裕税的形式从富裕的地方确保税收、以保持生活水平的公平。

6 总结与展望

正如摘要中所说的那样、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为什么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呢？本论文执笔的动机正是从这一疑问开始的。当得知这一疑问与《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一书的作者李约瑟博士一致时、便从李约瑟博士的“二因素循环论”（环境 \longleftrightarrow 科学技术 \longleftrightarrow 环境）的分析着手、其结果、将“二因素循环论”以“四因素循环论”（环境 \longleftrightarrow 思想 \longleftrightarrow 科学技术 \longleftrightarrow 经济 \longleftrightarrow 环境）的形式加以详细说明。并且、这种循环在中国从历史上是如何继承下来的、以及对取得了空前的经济发展的中国的将来能够提供哪些发展战略建议等等问题、我确信本论文对这些问题的解答能够提供一个方向。

具体说的话、在第一章中、说明了“环境·思想关系上的中国科技与经济发展的研究——中日比较——”这一题目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在第二章中、从所谓的“中国问题”这一观点、对中国至今是一个多么不被了解的国家、以及如何才能了解中国这些问题进行了说明。

薮内清〔110〕在其《中国的科学文明》一书中这样写到：“从最古的历史王朝‘殷’算起的话、中国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如果追溯到史前时代、追溯到汉民族定居中原的时代、中国已有五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在这个历史时期中、汉民族为主体建立起了高度的文明。一个民族能经历如此长的历史时期建立起独自の文明、并且这个民族至今仍受到世界的瞩目、这样的例子决无仅有。仅此一点、中国的存在也可以说是世界的奇迹。

‘明治维新’以来、我国的人民盯上了西欧文明、奋力要追赶它。这种情况至今未变、只是欧洲换成了美国。但这能说是日本的正确道路吗？对此、我想许多人都持有疑问。过去、日本无疑从中国得到了很多东西。从古代到‘江户时代’

末期、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是发达国家。我们从中国得到的恩惠太多、对此却回报的很少。并且、在我们盯上西欧文明之后、甚至对科学文明落后的中国的实情也失去了了解、并给中国带来了很大伤害。即使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强国、我们仍未去努力了解中国。”⁽¹⁾

这与本论文第二章中我的观点是完全相同的。这篇文章虽然是三十多年前写的、但遗憾的是其内容至今仍然通用。

该作者继续写到：“建立起高度科学文明的中国终于在近代科学方面落后于欧洲、为此而成为‘列强’进行殖民地化的对象、经历漫长的苦难之后、新中国诞生了。新中国今后将如何发展虽无法预测、但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同时也在想、科技的发展固然对国家和社会很重要、可更重要的是如何使科技为社会公益服务。科技的发展是无限的、如何管理它、使之为人民的幸福而服务不是现在更多的人所关心的事吗？过去的中国、在强有力的政治体制下谋求科技的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终究没能产生近代科学。

科技也是社会的产物、在旧的政治体制下、中国仍在探索科技的发展方向、即使无法预测将来怎样、至少现在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过去以及现在、具有优良政治性的中国人将如何发展科技是非常令人感兴趣和非常令人期待的。总之、希望这本书能通过科学文明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多少起一些作用。”⁽²⁾这完全与本论文的最终目的完全一致、也完全表达了我的心情。

从第三章开始进入各个部分的论述、首先说明了“四因素循环论”中的第一个循环、即补充了李约瑟“二因素循环论”中缺少的部分。在四大文明发源地之一、具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当中、统治者中产生了实质的、唯心的“中华思想”、被统治者中也产生了同样唯心的“中华思想”、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另一方面、到了西周时代、产生了对“天”这一最高神的信仰、统治者受“天”之命凌驾于人民之上、当失去“天命”时便改朝换代、这种革命思想、即“天命思想”便在这时产生了。这种“天命思想”不仅限于统治者、如前所述、“天命思想”以“家族制度”的形式也根深蒂固于被统治者地位的一般大众。

也就是说、“中华思想”以积极的形式产生于统治阶级、以消极的形式产生于被统治阶级。而“天命思想”则是积极地产生于两者之中、虽然两者所处的状况不同。从此以后、这两个巨大的思想便影响、控制着中国人的行动。

1949年新中国诞生以后、毛泽东经常讲的“独立自主·自立更生”这一句话无疑是从来源上不依靠别人的这一“中华思想”。另外、如果说公元前当权者就认为那是命运注定的话、也可以认为它与“天命思想”有一定联系、但作为结论、可以认为它主要是由“中华思想”派生而来的。

“独立自主·自立更生”这种观点到60年代为止确实具有很强的影响力、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我认为虽然程度上不同、但这种观点仍然存在。

第四章中论述了“四因素循环论”中的第二循环、即思想与科技的关系。中国具有四大文明发源地之一这样的优越条件、因而在世界上科技曾处于领先地位。14世纪以前、虽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制约因素、但中国仍能处于世界科技的领先地位、而15世纪以后、那些制约因素成了科技停滞的因素、这一点正如前面所论述的那样。

中国“隋代”出现了科举制度、开始从一般人民当中录用官吏。废除了“世袭”制、通过考试、只要是优秀人材、既使出身低下也可以成为最高的官僚。7世纪初、中国人便施行了这种方法、其政治感觉应该受到很高的评价。但另一方面、其考试的主要内容则是如何解释儒教的经典、如何写出漂亮的诗文、其结果、科学与技术上的优秀人材无法得以录用。也就是说、领先世界的文明发展与15世纪以后的科学停滞都是由于“中华思想”这一大思想作用的结果。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也可从说明这一点。日本是在推翻“幕藩”体制、无情地抛弃阻碍富国强兵方针执行的所有传统的情况下积极地学习西方。而中国则是在绝对君主制这一旧体制下、由那些有旧观念的官僚们无计划地进行的、甚至连推动“洋务运动”的高官们也并非从内心里承认西方的领先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确实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

相反、1979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政策”不是以前的形式上的“中体西用”、而是实质性的“中体西用”、因而科技的发展得以实现。但我并不认为“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华思想”从中国政治家的头脑中消失的结果。因为、长期的根本思想可以变弱、但决不会消失。

思想与科技相互作用的关系、林·山田[100]、篠原[101]及刘则渊[97]、[98]、[99]已做了论证⁽³⁾。篠原[101]这样说到：“支撑现在世界经济的国际货币体制由于主要货币国的双重赤字而处于非常不安定的状态之中。尽管如此、世界经济

中、象微电子、生物工程、新材料等领域的新技术革新得以发展、给产业界以很大影响。并且、进入1987年以后、超导体可能带来的对产业界广泛、有力的影响开始受到了关注、出现了超导体热的现象。

它对产业界的某些影响恐怕要在世纪末以后才会出现吧、但必须将它做为一个重要问题予以关注。我要说的很简单、世界经济确实处于一种全球性调节之下、如主要货币国的双重赤字、外汇汇率的激剧变动、初级产品——原油价格的相对低廉、债务危机的渗透、股价的暴跌等等。这些都是由于世界经济基本面的不安定因素而发生的、因而新技术革新的影响受到了抵消。但是、这种全球性调节何时达到某种程度安定下之后、以前隐藏在暗处的新技术观念便会浮出表面显现出来、对世界经济的长期发展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⁴⁾

第五章中的“四因素循环论”的第三循环是一个单纯循环、换句话说、对“需要是发明之母”所产生的需要从与1949年后的中国各种经济政策的关系上进行了说明（所使用的图表大多是70、80年代的、因而想在本章总结部分对其后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做一论述、但考虑到这一状况的明确性及篇幅限制、不得不忍痛割爱）。相反、“发明是需要之母”从现状看的话虽有程度上的差别但也是正确的、这个意义希望能从循环中的逆向箭头来理解。另外、这不仅适用于第三循环、也当然地适用于所有循环。

第七章主要要说明以上“四因素循环论”对现在的中国起何种作用。即、虽然列举了诸如“人治国家”向“法治国家”的根本转变、进一步促进市场经济、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国际化思考的贯彻、金融制度改革和实施、信息公开的促进以及收入差距的缩小等等问题、但中国的将来最终取决于中国对“四因素循环论”的起点即社会环境做了多大改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框架内、弄清什么是可能做到的、什么是不可能做到的。不可能做到的使之维持下去、而可能做到的即使花费时间也要做到底。中国政府如果表明这样一种坚定的态度的话、我确信中国还会取得更大的经济发展。

注

(1) 参见薮内清[110]的前言 i ~ ii。

(2) 参见薮内清[110]的前言 ii ~ iii。

- (3) 参见林雄二郎・山田圭一[100]、篠原三代平[101]及刘则渊[97]、[98]、[99]。
(4) 参见篠原三代平[101]PP. 3~4。

参考文献

- [1] White, Introduction: the New Course in Chinese Development Strategy: Context,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China's New Development Strategy, edited by Gray and White, Academic Press. (London) LTD, 1982, PP. 1~16.
- [2] SAICH, T, New Directions in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n China's New Development Strategy, edited by Gray, T and White, G.), Academic Press Inc. (London) LTD. 1982, PP. 19~36.
- [3] Yamada, M,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and the Modernization Program in China's New Development Strategy, edited by Gray, T, and White, G, Academic Press, Inc. (London) LTD, 1982, PP. 37~54.
- [4] Sutter, R, "China Perceived: An Analysis of the Official Reports of Congressional Visitors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Overseas Business Reports), November 1976.
- [5] Watson, A., the Management of the Industrial Economy: the Return of the Economists in China's New Development Strategy, edited by Gray, T. (London) LTD, 1982, PP. 87~118.
- [6] Macdougul, C, Policy changes in China's Foreign Trade Since the Death of Mao, 1976~1980 (in China's New Development Strategy, edited by Gray T and White, G), Academic Press Inc. (London), LTD. 1982, PP. 149~171.
- [7] Needham, T, Chinese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Kinseido, LTD, Tokyo 1970.
- [8] Buck, P. S, China—Past and Present, edited with Notes T. Shirai, Shinozaki Shorin, 1979.
- [9] Miller, A. and Morath, I., Chinese Encounters, edited with Notes by K. Yamaji, Shinozaki Shorin, 1980.
- [10] Weber, M.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I, Vierte, Photomechanisch Gedruckte Auflage, Tübingen, Verlag Vo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1947 (木全德雄译、《儒教和道教》、创文社、昭和50年)
- [11] Paul Vidal de La Blache, Principes de Humaine, Publec's daspre's Les Manusrits de l'Auteun Par Emmanuel de Martonne, Armand Colin, Paris, 1922 (饭塚浩二译《人文地理学原理》、岩波书店、昭和50年)
- [12] Needham, J.,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ume I、Introductory Orientation, The Syndics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ngland, 1954 (矿波

- 护、杉山三郎、胁本繁、田边胜美共译《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1卷序编》、思索社、1974年)
- [13] Needham, J.,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The Syndics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ngland, 1956. (吉川忠夫、佐藤保、木全德雄、岛尾康共译《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2卷思想史·上》思索社、1974年)
- [14] Lattimore, O., China: A Short History,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47. (小川修译《中国》、岩波书店、昭和34年)
- [15] Fairbank, J. K., China; The Peoples' Middle Kingdom and U.S.A. Cambridge, 1967. (工藤沈吉译《人民中国论》读卖新闻社、昭和45年)
- [16] Needham, J., Clerks and Craftsmen in China and the West, Lectures and Addresses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山田庆儿译、《东西学者与工匠·上》、河出书房新社、昭和49年)
- [17] Adler, S., The Chinese Economy,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1957 (本桥溥译《中国经济》、岩波书店、1958年)
- [18] Peyrefitte, A., Quand La Chine s'éveillera,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1973 (杉边利英译、《中国苏醒时世界将震撼》、白水社、1974年)
- [19] Barnett, A.D., Uncertain Passage; China's Transition to the Post Mao Era,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4. (石川忠雄、山田辰雄共译、《中国——毛泽东以后的过渡期——》、鹿岛出版会、昭和51年)
- [20] Eckstein, A., China's Economic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石川滋监译、《中国的经济革命》、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
- [21] Butterfield, F., 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 Times Books, 1982 (佐藤亮一译、《中国人·上卷》、时事通信社、昭和58年)
- [22] 同上、《中国人·下卷》。
- [23] 根岸侑著、《买办制度的研究》、日本图书株式会社、昭和23年。
- [24] 冈田武彦著、《中国和中国人》、学出版、昭和48年。
- [25] 中村元著、《比较思想论》、岩波书店、1960年。
- [26] 尾藤正英编、《日本文化与中国》、中国文化丛书第10卷、大修馆书店、昭和43年。
- [27] 津田左右吉著、《支那思想与日本》、《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0卷·历史学与历史教育》PP. 195~335、岩波书店、昭和40年。
- [28] 津田左右吉著、《谈支那思想》、《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3卷·论丛(一)》PP. 451~453、昭和40年。
- [29] 贝塚茂树著、《日本与日本人》、《贝塚茂树著作集·第9卷·中国思想与日本》PP. 331~367、中央公论社、昭和51年。
- [30] 贝塚茂树著、《何谓中国》、《贝塚茂树著作集·第10卷·孙文与毛泽东》PP. 281~333、中央公论社、昭和53年。

- [31]《和辻哲郎全集·第8卷·风土——意大利古寺巡礼》PP.121~168、岩波书店、1977年。
- [32]家永三郎著、《津田左右吉的思想史研究》、岩波书店、昭和47年。
- [33]野村浩一、《日本与中国·日中问题的思想课题》、《世界》第304号PP.35~52、岩波书店、1971年。
- [34]野村浩一、《中国革命与革命中国》、《世界》第310号、PP.38~49、岩波书店、1971年。
- [35]福泽谕吉著、《本素世界国尽·福泽谕吉集》PP.3~8、《唐人往来》同书PP.325~330、筑摩书房、昭和52年。
- [36]沟口雄三、《中国公私概念的展开》、《思想》NO.669PP.19~38、岩波书店、昭和55年。
- [37]今掘诚二、《中国革命和毛泽东选集》、《现代与思想》季刊N035PP.156~177、青木书店、1979年。
- [38]陵井三郎、《反革命战略‘缓和’与中国外交》、《现代与思想》季刊N035PP.20~57、青木书店、1979年。
- [39]中国研究中心编《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日本评论社、1982年。
- [40]拙著、《日中贸易论》、北九州贸易协会、1981年。
- [41]辻康吾著、《转换期的中国》、岩波新书店、1983年。
- [42]平岛成夫著、《上海日语专家》、利布劳波特、1983年。
- [43]《朝日新闻》1983年11月1日~1984年1月10日早刊及晚刊。
- [44]Eckstein, A., Galenson, W.&Liu, T.(ed.), Economic Trends in Communist China, Aldine Publishing Co, Chicago, 1968.
- [45]Wittfogel, K.A., Wirtschaft and Gesellschaft Chinas; Versuch derwissenschaftlichen Analyse einer guossen asiatischer Agrargesellschaft, EnsterTeil. (Schriften des Instituts fur Soziafonschung an der Universitat Frankfurt a. M.Verlag Von C.L.Hirschfeld Leipzig, 1931.(平野义太郎监译、《新订·解体过程中的中国经济与社会(二)》、原书房、1977年)。
- [46]Olga Lang, 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6.(小川修译、《中国的家庭与社会》、岩波书店、1953年)。
- [47]Quesnay, F<Despotism de la Chine, 1767.(滕谷在登译、《凯尼中国论》、白杨社、1940年)。
- [48]林语堂《东西的国民性》、鱼返义雄译、增进堂1946年。
- [49]林语堂《我国土、我国民》、新居格译、丰书院、1939年。
- [50]西川润《自力更生的政治经济学》、《经济评论》29卷10号、1980年10月。
- [51]久保田顺《自力更生论的第三世界》、文真堂。
- [52]西川润《中国与第三世界》、《中国经济研究月报》10月号、日本贸易振兴会、1974年10月。
- [53]西川润《中国模式与第三世界》、《中国研究月报》12月号、中国研究所、1974年12月。

- [54] 沙米鲁·马民《南北问题的本质》、《经济评论》第30卷第9号、日本评论社、1978年9月。
- [55] 张培基《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展望》、《中国经济研究月报》12月号、日本贸易振兴会、1980年12月。
- [56] 李崇威《中国的外资利用及经济相关法规》、《中国经济研究月报》12月号、日本贸易振兴会、1980年12月。
- [57] 西川博史《北京通信》、日本经济评论社、1982年11月。
- [58] 清水泰次《中国的家族与村落的特征》、文明协会、1927年5月。
- [59] 田崎仁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内外出版社、1926年10月。
- [60] 小竹文夫《中国的自然与文化》、弘文堂书房、1947年11月。
- [61] 吉川幸次郎《中国人的古典与生活》、岩波书店、1945年。
- [62] 矢吹晋《2000年的中国》、论创社、1984年7月。
- [63] 宫下忠雄《文革与中国经济》、所书店、1970年9月。
- [64] 小岛丽逸《中国的经济与技术》、劲草书房、1976年12月。
- [65] 吴承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现代化》、《亚洲经济旬报》1150、中国研究所、1980年5月上旬号。
- [66] 吴承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现代化》、《亚洲经济旬报》1151、中国研究所、1980年5月上旬号。
- [67] 丸山伸郎《中国的经济系统与现代化》、《经济评论》9月号、日本评论社、1980年9月。
- [68] 小岛清编《东亚经济与日本》、财团法人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1975年10月。
- [69] 石川滋编《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1980年3月。
- [70] 内藤昭《现代中国贸易论》、所书房、1979年3月。
- [71] 藤堂明保《汉字与文化》、德间书店、1968年4月。
- [72] 小宫隆太郎《现代中国经济》、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2月。
- [73] 南亮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东洋经济新报社、1990年9月。
- [74] 野村浩一《日本与中国——日中问题的思想课题》、《世界》第304号PP. 35~52、岩波书店、1971年。
- [75] 津田左右吉《论中国思想》、《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0卷·历史学与历史教育》PP. 195~335、岩波书店、1977年。
- [76] 和辻哲郎著《季节风风土的特殊形态》、《和辻哲郎全集·第8卷·风土——意大利古寺巡礼》PP. 121~169、岩波书店、1960年。
- [77] 凯恩斯(Keynes, J.M.) The End of Laissez-Faire & A Short View of Russia, Kenkyusha Modern English Readers 27, Feb, 1981。
- [78] 大辞林、三省堂、1989年3月。
- [79] 同书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浅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

- (坂元广子译《毛泽东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入门》、长崎出版社、1976年5月。
- [80]《80年代的日中关系》7、8、9、11、12月号、TAC企画、1980年。
- [81] 毛泽东著作选读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外文出版社、1967年。
- [82]《现代经济季刊》第39号、日本经济新闻社、1980年6月。
- [83]《北京周报》1980年第5、7、9、22、34、36、41、46、50号及1981年第1、4、10、14号、北京周报社。拙著《日中贸易论》、北九州贸易协会、1981年6月。
- [84] 三菱综合研究所中国研究室编《中国信息手册》、苍苍社、1987年。
- [85]《日本经济新闻》2002年1月13日早刊。
- [86] 赵思希“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AMS PRESS, New York, N. Y. 10003, 1970.
- [87]《读卖新闻》5/1~7/10, 1978及3/10, 1979。
- [88]《读卖新闻》1979年5月28日、6月4日, 及7月23日。
- [89]《海外市场白皮书——世界贸易现状》、日本贸易振兴会、1979年。
- [90]《中国市场动向年报》1985年版、未来预测研究所、1985年5月。
- [91] 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编《日中两国能源供需构造的现状与将来展望》、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昭和61年11月。
- [92] Nai—Ruem Chen & Walter Gallenson, The Chinese Economy under Communism, Aldiue Ather for /Chicago & New York, 1972.
- [93] Peter, W. Colm and Chinese Petroleum Developments to 1980, Institute for Difference Analysis, 1976.
- [94] Allen, G. C & Donnthorne, A. G. Western Enterprise in Fas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Japan, Augutus M. Kelleg, Publishers New York, New York, 1968.
- [95]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Policy, Report of Henry M. Jackson to th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and on Energy and Natural Resources, U.S. Senate, March, 1978.
- [96] Seno—American Relations, A New Turn, U. 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January 1979.
- [97] 刘则渊《论科学技术与发展》、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
- [98] 刘则渊《现代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院、2001年。
- [99] 刘则渊《李约瑟悖论：近代科学技术为什么未起源于中国》、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2001年。
- [100] 林雄二郎·山田圭一编《科学的生命周期》、中央公论社、1995。
- [101] 篠原三代平编《国际货币·技术革新·长期波动》、东洋经济新报社、1988年。
- [102]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62. (中山茂译《科学革命的构造》、米斯子书房、1971

- 年)。
- [103] C. P. Snow, *The Two Cultures: A Second Look*,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64. (松井卷之助译《二个文化与科学革命》、米斯子书房、1967年)。
- [104] 高木仁三郎《科学要变化》、东洋经济新报社、1979年。
- [105] 山田庆儿《科学与技术的近代》、朝日新闻社、1982年。
- [106] David E. Newton, *Science Ethics.*, UN I Agency, Inc., Tokyo, 1987. (牧野贤治译《科学家的矛盾与选择》、化学同人、1990年。
- [107] 岩波书店编辑部编《科学技术的开发与新社会》、岩波书店、1983年。
- [108] 村上阳一郎《文化上的科学/技术》、岩波书店、2001年。
- [109] R. F. Jevons: *Science Observed—Science as a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Activity*, George Allen & Urwin, Ltd., 1972. (松井卷之助译《科学的意义》、产业图书、1983年)。
- [110] 薮内清《中国的科学文明》、岩波书店、1970年。